

# 重评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sup>\*</sup>

伏炎安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观。该主张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但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最终只能以纯学理的财富留予后人以借鉴。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杜亚泉;东西文化调和观

**中图分类号:** K143;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5)02-0047-06

**作者简介:**伏炎安(1978-),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导师郑大华教授。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五四”研究往往集中于新文化人士,而很少涉及东方文化派;涉及的也是立足于批判。90年代以后的“五四”研究又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对东方文化派的研究不仅成为学术热点,而且对其评价也有过于拨高之嫌。在当今改革开放,中西思想文化再度全方位交流的时代,我们应对当年非新文化派人士提出的各种主张、见解重新予以客观的分析,从其不合时宜的理论体系中审慎地剥取其合理的内核,从而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基于这一原则,本文对五四前后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作一新的评价。

## (一)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少数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以及研究东方学术的人士就开始意识到,欧洲人自命为“高等文化的使者”,持有“将那些

原始种族和古老的民族从迟钝和麻木中拯救出来的‘嗜好’”<sup>[1]</sup>等行为正是对自身弊病和东方文明都未充分了解的表现。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在《联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中便指出:“吾西人向曾诋中国之哲学为逆理,其美术为幼稚,其宗教为邪恶,其诗歌为无情,其道德为野蛮,其习俗为失当,至今始恍然如梦觉。知向之所诋之言,无一不谬。”<sup>[2]</sup>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残酷的战争现实在充满自信的欧洲人面前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从而打破了西方对理性和科学的乐观态度,极大地冲击了欧洲人的文化自信心,甚至使其一部分欧洲人对其文化予以完全自我否定。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国中学教师斯宾格勒在他着笔于战前、脱稿和出版于战后(1918-1922年)的《西方的没落》<sup>[3]</sup>一书中,以敏锐的眼光揭示了西方文明弊端丛生及欧洲文化中心论破产的种种事实,其见

\* 收稿日期:2005-02-15

解在经过欧战打击后的西方世界得到了许多方面的暂时印证,激化了欧洲人的文化危机感,引起了他们强烈的思想共鸣。这种对西方文化怀疑和不信任的情绪,促使许多著名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注重精神文明”的东方文化,希望以东西文化调和的方式,拯救西方文化。正如胡愈之在《泰戈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中所写的,“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很有些怀疑,醉心于东方文化的着实不少”。<sup>[4]</sup>(P79-83)同时,一战的爆发与欧洲文化危机感的出现也刺激了一直苦于探索民族出路的中国进步人士开始反思欧战,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以应对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战后访问过中国的罗素曾提到过,访华期间有不少人对他说,1914年以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但自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sup>[5]</sup>(P190-191)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有人认识到欧洲“文明日进,杀人之械且日工。而将来政治上之剧变,必益不可方物。”<sup>[6]</sup>更有柏林大学格致科博士夏元瑛认为,一战“实白种各族之权利竞争”,“各欲握世界之霸权,故酿成此古所未有之大惨剧”,且“数年来欧洲出版逆料大战祸之书,亦已甚多,盖人种战争之势,其成久矣。”<sup>[7]</sup>

从个人的生活背景来看,早年立志走科举成名之道的杜亚泉深入钻研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1895年,杜亚泉受甲午战败的刺激,思想上渐生以讲求实学而济世救民之转变,嗣以经史训诂之学为无裨实用,而翻然改志,绝意仕进,改习数学,由中法而西法,特别是在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及理科教员期间(1898-1900年),自习日文,以便翻阅日文书刊。于是他由阅读日文书刊而窥见世界新思潮,对中国传统学说不免渐生怀疑,且于讨论时事问题时,往往偏于革新方面,从而逐渐形成了其纯学理上的中西文化调和论思想。<sup>[8]</sup>1902年他在《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中就明确指出:“世界之文明者,有二大潮流,即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是也”,“诸同学在校或他日出校之责任,第一当研求科学以补东洋文明之不足,第二研究固有之文明,与西洋之文明包含而化合之,以表章一绝新之文明……以为东洋之特色”。<sup>[9]</sup>1911年春,杜亚泉兼任商务《东方杂志》主编,既大胆刷新,使《东方杂志》成为民初国内影响最大的学术政论综合刊物;又尽瘁著作,不染政党色彩,独立不倚地纯以学理国情为根据,针对社会现实发表了一系列调和中西的文章,其调和观日益成熟。比如,在政治方面,

是年3月他发表了《减政主义》和《政党论》,提倡参照西方来改革本国政治体制,反对集权政治,促进“市民社会”生长,实行“进步与保守两党制”。中华民国成立后,杜氏就政治建设发表自己的调和主张,“今后之谋国者,不可不折衷于”“集权制与分权制”“二者之间,以求调剂之法”<sup>[10]</sup>,并且认为革命后建立的“民主立宪之中华民国,即由此二大政潮(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之相推相荡而成”<sup>[11]</sup>。一战的爆发带给中国人巨大的震动,杜亚泉深入反思,先后发表《大战争与中国》、《大战争之所感》,认为西方文化在战争中已尽露弊端,国人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而不能全盘照搬西方<sup>[12]</sup>。此后,他又陆续写成《现代文明之弱点》(第9卷11号)、《理性之势力》(第10卷6号)、《接续主义》(第11卷1号)、《社会协力主义》(第12卷1号)、《论思想战》(第12卷3号)、《波海会》(第12卷5号)、《命运说》(第12卷7号)等文章,提倡思想多元、兼采中西,以图于平稳中实现救国目的。<sup>[14]</sup>

杜氏东西文化调和观成熟的标志是1916年10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他从东西文化是“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这一认识出发,指出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两文明之结果,其不能无流弊,盖相等也”;“至于今日,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sup>[15]</sup>

## (二)

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建设方面,杜亚泉主张在批判的基础上对东西文化进行综合创新。他是欧战爆发后第一个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吾人欲借西洋文明“以去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平情而论”,“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二者皆不免其病态。“就经济状态而言,东洋社会,为全体的贫血症;西洋社会,则局处的充血症也”。“就道德状态而言,在东洋社会,为精神薄弱,为麻痹状态;西洋社会为精神错乱,为狂躁状态。”<sup>[16]</sup>他还分析了“吾人”与“欧人”对于死的不同态度(“欧人”“多言死之无痛苦”,而“吾人”“自古迄今,皆以死为最可恐怖之境”),得出双方的思想在

根本上是不同的,故吾国如“欲模仿西洋文明,则非从思想上根本改革不可,即非输入死之哲学不可”,而其效果又“当以死之哲学能否普及为断也。”<sup>[17]</sup>因此,杜氏指出,中国社会与西洋欧美社会,“文明之根柢既不相同,则生活之方法亦自然各异。与其违理性以仿效他社会之文明,不如循理性以行,随时势而加以调节之为愈也。”<sup>[18]</sup>

在具体分析中西文明时,杜氏认为近世西洋文明有许多成分本源自我国,“为吾国之老生常谈。惟自欧化输入以来,此等常谈几已无人置喙,以谓与新世界之文明不相容也”,而其“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近世西洋学者对于东洋文明之智识渐渐深造。故社会主义之文学家如托尔斯泰氏之著作中屡屡引用孔孟之语,且极致钦崇之意;克鲁巴金氏之著作倡颂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黎民不饥不寒等之经济论,其思想亦殆由孟子之社会主义中会得。……吾国五千年以前之旧文明将流入西洋发生二十世纪之新文明。愿吾国人勿拾取西洋十八九世纪中已被破坏之文明断片掎击吾人之固有文明而蔑视老生常谈以谓不宜置喙焉。”<sup>[19]</sup>针对新文化运动的盲目西化与反纲常名教及其造成的信仰变化不定,杜氏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并提出文明统整说。“我国之有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然及西洋学说输入,“吾人得其一时一家之学说,信以为是,弃其向所以为是者而从之;继更得其一一家一时之学说,信以为是,复弃其适所以为是者而从之。卒之固有之是,既破弃无遗,而输入之是,则又恍焉惚焉而无所守”。于是,我国精神界中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拨,互相抵消,而无复有一物之存在。“如斯现状,可谓之精神界之破产。”对此精神危机,杜氏认为,其“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sup>[20]</sup>为此,陈独秀撰文质难,指责《东方杂志》为儒家伦理辩护,属“复辟”思想。杜亚泉又作出回应,其“文明之统整”,绝非“禁遏学术阻碍文化”,“亦非不翻译欧洲书不输入欧洲文化”,而是以为“吾国”“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

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sup>[21]</sup>

一战结束后,杜亚泉对“中西新旧”有了新的认识。“新思想者,依吾人之理性,于事物或观念间,附以从前未有之关系,此关系成立以后,则对于从前所附之关系,即旧思想而言,谓之新思想。”<sup>[22]</sup>而“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揭“折衷论”之总义,“则吾人主张以现代文明为表,以未来文明为里,表面上为奋斗的个人主义,精神上为和平的社会主义。不奋斗不足以生存于现世,吾人决不愿以黄老派之玄谈,柏拉图之理想,自误误人。至共产均富之社会,虽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世界,但不妨建设之于吾人之心。……以俭惜物,以勤治生,严于守己而勿吝于给人,是为中国之古君子,是为世界之新人物。”<sup>[23]</sup>

政治领域,在人才选拔的手段问题上,杜亚泉反对知识界迷信西方选举制度而蔑视中国沿用一千多年之久的考试制度的偏激之见,倡导选举与考试两种选举手段的兼容互补。“吾人二十年来,厌弃考试,信仰选举。以为选举者,西洋之新法则,至公普之法则也,立宪国家之流行品也;考试者,吾国之旧法则也,至腐败之法则也,科举时代之老废物也。不谓吾国之老废物,乃成西洋之流行品,朽腐忽化为神奇,吾不能不为吾先民发明考试方法者,庆其幸运。”“选举与考试,实为至相类似之物。以为公普,则皆公普者也;以为腐败,则皆腐败者也。善用之而使之公普,皆足以利国福民;不善用之而使之腐败,则病国殃民,亦无以异。”<sup>[24]</sup>

杜亚泉冷静地观察与分析中华民国成立后事变迭出的不稳定政局,主张借鉴西洋社会的政策措施以融入我国的政治建设。“吾国政治之腐败、民气之衰颓、实业之凋落,比之欧美,诚觉相形见绌。”<sup>[25]</sup>“今吾国既有法美以为殷鉴,则若者宜引为厉戒,若者当借作师资,舍短取长,不难避歧趋而即于正轨。”<sup>[26]</sup>为实现政治稳定,他撰《力之调节》,进一步主张效仿西洋之政治原理,倡两党政治。“政治进行,全赖对抗力之作用。”若有两种势力“相与抗衡”,则“公理以相持而益显,权力亦以相竞而愈平,欧美政象所以能常保均势,不至畸轻重者,皆政党对抗之结果也”。当然,要“养成有秩序之对抗”,须调节对抗之势力,“调节之有裨于对抗”,“夫而后可立平民政治之基础,可树政党对峙之模型,故相

因而不相背者矣”。<sup>[27]</sup>

伦理道德建设方面,杜亚泉坚持中西调和的观点,反对新文化派彻底废弃传统旧伦理道德而代之以西方新伦理道德的激进主张。深入反思“中国固有之道德,果适合于今日之现象乎”的杜亚泉对比分析中西得出,中国道德之大体可以不变,“不特今日不变,即再历千百年而亦可以不变”;近世“欧美学者”倡人群进化时“以爱为一大原则”,与我国“克己、复礼、亲亲、仁民、爱物”诸古训,均隐相吻合,故我国亦宜“阐明旧有之仁爱”,“发辉而光大之”。<sup>[28]</sup>当然,他并不是盲目地守旧,而是经过具体对比分析中西伦理道德之优劣,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适合中国的主张。

第一、以“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德”<sup>[29]</sup>为原则,去努力建构中西融合的个人、家庭、国家多元平衡互动的道德体系。我国“互助的”“大家庭制度”易造成“少年者多浮浪,老年者多贪鄙”,且“为害于国家,于今日实为最烈”,其补救之道,不可不于“互助之制度”中,采用西方“小家庭制度”之“独立”精神。<sup>[30]</sup>然而考虑到“民族各有其历史与习惯”与“吾国家制度,自有可以宝贵之精神”,杜氏反对“根本改变”我国家族旧习而行欧美个人主义之小家庭,主张对于旧风习,当求“减除其弊害而不当妄事更张”;对于新风习,但当“酌采所长而不宜为无意识之模仿”。<sup>[31]</sup>关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杜氏认为“宜守定”两者“之分际”,遇有个人政见与国家现势格不相入时,则当“稍贬方针,以为妥协调和之”。<sup>[32]</sup>第二、希望大总统于政务之外大力提倡道德文化事业。古来专制君主留令名于历史者,大都是恭俭仁慈、兴教劝学、有功道德及文化的人。“求之外国”,如英皇之提倡戒酒会,日皇之设立济生会,德皇之提倡文艺,类是之事迹甚多。“予不暇细忆,其注意于道德文化亦同”。共和国元首,虽无世袭君主之势力,但足以提揭群流,化民成俗。<sup>[33]</sup>第三、提倡适合中国的“妇女职业”。“妇女职业”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自欧战发生以来,“妇女职业”之说,盛传于欧美,且我国近数年来“亦竞提倡是说”,以为妇女当求自立。对此,杜氏从中国当时现实出发,提出“与其为少数妇女启辟都市中执业之新途,无宁为多数妇女维持乡里间固有之生计”,其具体做法为:其未经衰落者,当设法以保存;其业经衰落者,当竭力以挽救;其无可挽救者,则当随时势之所趋,发明一二新事业,予妇女以执业之机会。<sup>[34]</sup>第四、提倡西方文明结婚,反对传统婚礼的

繁文缛节。西洋人婚丧典礼,“概较我国为单简”。如果这种风气能移植于我国,则足以纠正“末世文胜之弊”。因此,杜氏主张,我国婚礼应仿效西洋礼式,去其繁琐,实行“文明结婚”。<sup>[35]</sup>第五、主张节俭,反对追求奢华生活。杜亚泉于《说俭》中写道,“俭”为克己主义中之美德,我国经传及诸儒学说先哲格言,多称道之,“不俭”将有损于个人,且严重者足以堕落社会道德,剥丧国家元气;虽然最近数十年,我国生活程度陡然增进,然而这是受欧美物质文明的吸引,“欲望无穷”,而我国“物产有限”,“不俭”将势必“相夺相争”,祸“起于萧墙之内”。因此他倡导,“吾人今日”仍当持守“节俭主义”。<sup>[36]</sup>第六、提倡健康的朋友关系。中国传统的交友之道,“概以义气为重”,不管正当与否,凡朋友之利益必为之顾全,朋友之危难必为之解救,由此“实利上互助”之“习惯”而酿成对朋友的“依赖根性”,以致“其流弊所极,往往徇私而害公”。因此,杜氏主张仿效西方,交朋友必须选择那些能独立自主、权利义务界限分明而不混淆的人。<sup>[37]</sup>第七、倡公墓与族葬兼行之丧葬礼俗。“近时国人多有主张仿欧美制度筹辟公共墓地者”,他们认为我国大量“可耕种之田”“为坟墓所占”,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故公墓之制,不可不切实励行”;然而我国家族观念异常深固,国人坚持死后同葬于一处,故杜亚泉提倡“族葬与公墓相辅而行”。具体办法是必须限制墓地面积,地域宜在山原或高瘠之区,“毋夺水田沃壤之利”,且未“造葬之余地”,继续种农作物,“已造葬之隙地”,“或栽种果树”但不准砍伐,“或培养森林以为地方风景之点缀”。<sup>[38]</sup>

医学方面,兼备中西医学知识的杜亚泉主张中西医学兼容互补、融会贯通。五四时期在医学领域也出现了中西医学的互不相容,“习西医者排斥中医,谓中医专重阴阳五行之说,凭臆想而不求实验;信中医者排斥西医,谓西医多用金石剧烈之药,精外科而不善内治。”杜氏从其亲身经历出发对比分析中西医学,“余往时习闻中医之理法于父兄,近复稍阅西医书册,觉医学中精到之处,中西学说,若合符节。有中医相传之理,语焉不详,而西医则竟委穷源,了如指掌者,以西医之说考之则益明;有西医发明之事,诘为新得,而中医则习用已久,视为故常者,以中医之法证之则益信”,且“夫学术者在于实事求是”,无“中西之别”,因此他主张“融会而贯通”“中西医学”。<sup>[39]</sup>杜氏还进一步从研究方法上阐明了“中西医学”的相互融合互补,合理利用“专从心

灵的体会上着手”的中医学之“经验”和西医学的“科学的方法”，<sup>[40]</sup>推进医学研究。

### (三)

世界范围内的每个民族都有其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有其独特的、合理的存在价值。倡导思想文化多元互补的杜亚泉认识到了东西民族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其思想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我国之有国是”是无数先民共同经营缔造而成的民族文化“结晶体”，自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且近世西洋文明有许多成分本源自我国，“为吾国之老生常谈”。因此，他反对彻底否定传统去搞“西化”或“全盘西化”，而应“循理性”、“随时势”地“输入新知以昌明旧学”。经过客观冷静地对比中西，杜亚泉看到了我国文明之不足，“比之欧美，诚觉相形见绌”，经济上为“全体的贫血症”，精神上处于“麻痹状态”；然一战造成的人类空前大灾难让他也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两种文明均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于是，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固守传统，而主张“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以吾国固有之文明为绳索”来贯串“断片”之西洋文明，“融合而会通之”，乃“统整”出中华新文明，不但使“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

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他主张反对集权政治以促进“市民社会”生长，仿效西方实行两党制，养成“对抗之势力”，立“平民政治”之基础，这些反映了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已经注意到了平民阶层的利益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他认识到了中国“大家庭制度”的“互助”功效，打破家族观念将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因而主张以“小家庭制度”的“独立”去补充“大家庭制度”的“互助”，以开创新时期的家庭制度，主张“公墓”与“族葬”并用的丧葬礼俗；中国历来注重勤俭节约，在面临物欲横流、且因利益冲突而常常“祸起萧墙”的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物产有限”的中国应坚持节俭，避无穷欲望之害，这里他已注意到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相互关系；杜氏有明显的务实精神，能从实际出发予以分析，如在创办妇女职业方面，他主张当时的中国（农业大国）不宜另辟“都市中执业之新途”，而当“为多数妇女维持乡里间固有之生计”；又如无论选举还是考试均不过是选拔人才的手段，有效地予以利用便利

于社会发展，使用不当便会总是自己的不如别人的好；杜氏还强调总统应倡导道德文化事业，代表政府行使其社会文化职能；等等。

杜氏的文化调和论主要是学理上的分析，其主张只符合正常的文化发展轨迹，而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的主体仍是封建文化，不仅是物质文明，还包括精神文明，都毫无疑问地落后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杜亚泉过分偏执以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来对比西方文化的不足之处，不承认中华文化在时代上早已落后于西方文化。他的调和论只注重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而忽视了其时代性的一面。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既是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既是特定民族在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时代的特定民族的文化；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集合体。五四时期东西文化的差别应当既是“古今之别”，又是“中外（类型）之异”。因此，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论并不能在急切实现民族独立与振兴的五四时期得到重视和发挥效用，而是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以学理的财富形式留给后人在和平建设时期借鉴。

杜氏的调和论是时代的思想产物。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的时期，思想的分化与重组异常激烈。辛亥革命因袁世凯的篡权和复辟而全面失败，使苦苦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从思想文化层面反思革命。文化激进主义者将革命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袁世凯进行复辟所利用的孔教伦理的存在，因而主张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与之相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也承认中国革命不成功有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但一战爆发后的西方社会现实引起的国内反思和危难关头高涨的民族主义使传统文化根底异常深厚的他们主张坚持以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来吸收内化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以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杜亚泉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尽管前期“心窃向往”西学，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善于现实关怀而生性冷淡、富有主见的他以其中西兼通的知识结构和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从纯学理上入手倡导东西文化调和，以图在平稳的状态下建设完美的民族新文化。

杜亚泉提出的“调和论”作为“西化论”的对立物给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造成过一些阻力，但也正因为其存在着许多合理的因素，它正好弥补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过激言论与主张的不足，

从而促进新文化派不断自我调整与完善。两者的论争对推动五四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瓦莱里. 中国和西方[A]. 何兆武. 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C].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2] 庄士敦. 联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J]. 东方杂志, 1913, 9(12). 4-10.
- [3] 郑大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J]. 浙江学刊, 2002, (5).
- [4] 愈之. 泰戈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J]. 东方杂志, 1930, 18(17).
- [5] 罗素. 中国之问题[M]. 北京: 中华书局, 1924.
- [6] 战争声中之新感想一录时报[J]. 东方杂志(11卷5号).
- [7] 夏元瑛. 欧洲战祸之原因[J]. 东方杂志(12卷2号).
- [8][13][14] 详见高力克. 杜亚泉编年事辑[C]. 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9] 杜亚泉. 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J]. 普通学报, 第4期.
- [10] 伦父. 中华民国之前途[J]. 东方杂志(8卷10号).
- [11] 伦父. 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上篇·通论[J]. 东方杂志(9卷7号).
- [12] 伦父.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J]. 东方杂志(11卷3、4号).
- [15] 伦父.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J]. 东方杂志(13卷10号).
- [16] 伦父.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J]. 东方杂志(14卷4号).
- [17] 伦父. 死之哲学[J]. 东方杂志(15卷3号).

- [18] 伦父. 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J]. 东方杂志(15卷1号).
- [19] 伦父. 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J]. 东方杂志(15卷10号).
- [20] 伦父. 迷乱之现代人心[J]. 东方杂志(15卷4号).
- [21] 伦父. 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J]. 东方杂志(15卷12号).
- [22] 伦父. 何谓新思想[J]. 东方杂志(16卷11号).
- [23] 伦父. 新旧思想之折衷[J]. 东方杂志(16卷9号).
- [24] 伦父. 选举与考试[J]. 东方杂志(14卷2号).
- [25] 高劳. 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J]. 东方杂志(15卷12号).
- [26] 高劳. 今后时局之觉悟[J]. 东方杂志(14卷8号).
- [27] 高劳. 力之调节[J]. 东方杂志(13卷6号).
- [28] 高劳. 国民今后之道德[J]. 东方杂志(10卷5号).
- [29] 伦父. 中国之新生命[J]. 东方杂志(15卷7号).
- [30] 伦父. 家庭与国家[J]. 东方杂志(13卷3号).
- [31] 高劳. 家庭之改革[J]. 东方杂志(14卷4号).
- [32] 高劳.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J]. 东方杂志(14卷3号).
- [33] 杜亚泉. 予所愿望于大总统者[J]. 东方杂志(13卷10号).
- [34] 高劳. 妇女职业[J]. 东方杂志(14卷3号).
- [35] 伦父. 文明结婚[J]. 东方杂志(14卷5号).
- [36] 高劳. 说俭[J]. 东方杂志(14卷6号).
- [37] 伦父. 交友[J]. 东方杂志(14卷8号).
- [38] 高劳. 族葬[J]. 东方杂志(15卷11号).
- [39] 杜亚泉. 中西验方新编叙言[J]. 东方杂志(13卷11号).
- [40] 杜亚泉. 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J]. 学艺(2卷8号).
- [41] 伦父. 自由结婚[J]. 东方杂志(14卷5号).

## A Review of Du Yaquan's Theory of Harmony and Mutual Supply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FU Yan-an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World War I and the sense of unreliability on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 from them, which both existed in the mind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eople, greatly triggered Du Yaquan who had been trying to seek a way to save our country out of the national crisis from the West. After compar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objectively, and giving a retrospection upon traditional culture calmly, Du Yaquan put forward his theory of harmony and mutual supply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His perception sufficiently recognized the national features of the civilization, but neglected its features in that special period, and ultimately made it a theoretical fortune for the people coming behind to take lessons from.

**Key words:** World War I; Du Yaquan; the theory of harmony and mutual supply;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